

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闵泽平

[摘要] 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衡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南宋散文;冷落;理学;古文;古道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8)05-0609-05

一

唐宋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进入极盛时期的产物,南宋散文是唐宋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人们谈到唐宋散文,往往将南宋散文剔除在外。南宋以后,古文选本层出不穷,取舍各异,却少有南宋之文。历代文话汗牛充栋,大多对南宋文章略而不论。即使在古代文学研究日益细致乃至近乎琐碎的今天,亦少有专家学者对南宋散文进行深入研讨。南宋固然没有涌现出与唐宋八大家相颉颃的杰出作家,南宋作家固然没有能够对传统散文艺术做出开拓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南宋散文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独有的艺术价值。南宋紧承北宋古文创作高峰,创作更为繁荣,文体更为完备,文集更为繁富,其文论之勃兴与选本之迭出及文派之粗成,都是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动向,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散文备受冷落,原因颇为复杂。一方面,南宋散文发展紧随北宋散文创作高峰之后,“平弱”的缺陷相对醒目;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古文艺术和学术思想双双进入梳理、总结、集成的重要时期,局面庞杂,深入探讨古文演进历程实非易事。前人既少有申说,后来者亦不愿开拓、深化,“偶尔为之”、“大体言之”就成为南宋散文研究的常态。其间,理学对文学的敌意实为最便捷的武器,可以轻易地抹杀所有业已显现的责难及可能存在的挑战。因此,重新评介南宋散文的愿望,或为道学的恶谥所阻隔,或因头绪的繁多而断绝。

明代以后,八大家之说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论及唐宋散文,多引八家之文为证。南宋散文在整体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由于观念的局限等诸多因素,南宋散文的整体特色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南宋一代,和战之争贯穿始终,“铁马冰河”最引人瞩目,金戈之声最为嘹亮,抗战救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社会形势对文风流变的影响十分显著。南渡之初,民族危机严重,士人多使气逞性,出语峻急;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士人义愤填膺,为文无所遮拦;宋季之时,国家岌岌可危,忠烈之气充斥天地,宋朝既亡,则激昂化为悲凉。因此,爱国志士的慷慨之文历来被视为南宋散文的主体部分。

社会氛围对文章走向的影响固然巨大,文化土壤对艺术风格的影响却更为深远。南宋之初、南宋之

末文章的引人瞩目,但它们并非南宋文章的主体,抗战与救亡也非南宋人生活的全部。南宋散文的繁荣,不在南渡之初,不在南宋之季,而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期。孝宗隆兴以后,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诗词创作进入中兴,散文不甘落后,一时名家备出,文集繁富,文派林立,文备众体,文论勃兴,选本迭出。

南宋中兴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讲学的兴盛、学派的林立,所以其时作家的构成,主要是学者而非志士;散文的主体,是理学家之文而非志士之文。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文学家与道学家对立起来。由于后人对理学家的文章多持贬抑态度,事实上也就使南宋散文的主导特色遭到冷落。因此,要提升南宋散文的整体地位,改变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状态,就必须改变传统观念,拓展原有视野,给予南宋理学家的古文以正确的评价。

二

观念的陈旧与认识的偏差从来就是学者的天敌。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亦与此相关。南宋散文研究的展开,首先要面对的是它与南宋主流思想即理学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偏差”,就是或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对理学的认识偏重于阐发它的消极质素,或阴差阳错,张冠李戴,将古文的批评误解为对其艺术独立性的突出;所谓“陈旧”,即陈陈相因,无所发明,始终位于既定的传统立场,满足于把理学与古文置于对峙状态,消弭任何互动的良性因子。简而言之,就是过分夸大理学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消极影响,强烈渲染理学对文学的破坏性,从而极度轻视为理学文化所包裹的南宋散文。理学对诗、词的影响如何,今人多有专门论述,毋庸赘述。不过,对学术思想依赖程度的不同,本是诗、文(包括词)文体差异的重要表现,即使理学对诗、词的作用多在负面之列,也不能就此得出理学阻碍古文发展的结论。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诸文体中,“古文”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那就是与儒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无法割裂的依赖性。“古文”在艺术上确实具有相对独立性,即无论结构、体制、法度、语言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殊规范,但其艺术精神,主要锁定在儒道范围内,并由此主导着古文的审美属性、风格走向乃至语言特色。“古文”的命运,它的生存与发展,始终与儒学的兴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是古往今来的研究者都无法回避、不应忽视而又偏偏所经常遗忘的一个基本前提。从唐宋散文的发生之日开始,无论是摇旗呐喊的先行者,还是推波助澜的实践者,即使是唐宋散文的坚定支持者和古文运动重要参与者,都曾对“古文”的认识发生过严重偏差,都曾忽视过“古文”的核心是“古道”这一简单的事实。时至十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把“古文”理解为文辞之古、文风之古、文体之古的现象,依旧存留在众多研究者的意识中。

唐宋散文演进的历程,清晰地展示出“古道”在古文运动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仅就今日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艺术表现力而言,开、天年间古文的艰涩乃至不可卒读,韩门一派的磔裂章句、奇奇怪怪,甚至一代唐文的奇崛之风,都与他们过度关注文辞复古、文风复古、文体复古相关联;韩、柳的伟大,则在于他们始终把“古道”作为“古文”区别时文的主要标准,故而在创作中既承袭先秦两汉之散文单句形式与古朴言辞及文风,又大胆汲取作为讨伐对象的六朝美文的艺术成就,集八代之菁华,成一家之面目。“古文”本为宣扬“古道”而起,宣扬“古道”意在复兴儒学,儒学在唐代的生存状况,实质上左右着古文命运。中唐“古文”的爆发,晚唐“古文”的低落,即与儒学的盛衰相一致;有唐一代“古文”发展的迟缓,也是唐代儒学艰难复兴的写照。进而言之,北宋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就是儒学彻底复兴的重要特征;没有儒学的全面胜利,“古文”的彻底复兴是不可想象的。具体说来,北宋古文的勃兴,得力于平易之风的确立;平易之风的确立,固然与欧阳修等众多古文大家的及时修正及皇帝的提倡等因素相关,同时也是儒学复兴进程中,古文家对“古道”理解相应深化的结果。所谓“道不远人”,文亦如此。

研究者对“古文”的误解,无形中消弭了理学与“古文”之间的联系,夸大了二者对峙期间的紧张程度。理学滥觞的历史,生动地说明了理学与“古文”并非天然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同一壕沟的战友”。为复兴儒学,古文家们纷纷对“古道”进行了阐释。这些日趋精微细密的论述,实际上蕴涵着理学的因子,没有学理的支撑,不可能成为古文大家,文学研究者眼中的古文大家,几

乎无一不是理学先驱或理学家。即使那些专注于学术、在古文写作中没有太多天赋的理学先驱,也对古文运动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与理解。正是这批思想家,包括那些我们后来所特称的古文大家,他们的共同努力才迎来儒学的升华,才实现了古文的勃兴;也就是在这些思想家包括那些古文家的探索中,理学开始萌芽直至形成。因此,古文的勃兴与理学的滥觞,发生于同一文化思潮之中;理学与古文,也就拥有了一段不证自明的“同盟关系”。

任何体系一旦形成,就要剔除异己以维护自身的纯洁性与严密性。理学如此,“古文”亦不例外。二者的对立,是它们为了显示各自的独立性,为了保护自己的疆域不受侵蚀,而刻意夸大差异、制造距离的自然行为。在这场分离运动中,理学处于强势地位,主动性更强,后来所遭受的非议相应较多。理学是儒学的学理化,是儒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古道”与理学具有极为密切的因缘,但这并不能掩盖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古道”是面对社会的,力求解决的是现实问题;但理学更为关注的是形而上的世界,是终极关怀等问题,是普遍意义上生存状况与困惑。文学致力于贴近生活,以反映现实的纷繁复杂和情感的变幻不定为己任。与此对应,理学则试图远离感性世界,以对现实与情感的最大限度地压缩,来获取最为持久的存在与运用。因此,凡是对义理、性命等问题有所干碍的举动,都受到了正统理学家的攻击。仅就此而言,时文与“古文”在他们眼中并无区别,即如朱熹《答徐载叔书》所云:“所喻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论其极,其使学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而在古文家看来,古文并没有违背它宣扬“古道”、复兴儒学的宗旨,而是道学家远离了它干预社会、依托人生的立场。“作文害道”与“酷不入情”的差异,究其实质,在于对“道”的理解不同,在于学理化与实践性的差异。

随着理学体系的日趋完善,“道”的内涵也随之扩充。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非正统理学家,更具有强烈的事功倾向。这种对外在世界的直接干预,实际上就是一个封闭体系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巧合的是,越是事功色彩突出,他们身上的文学色彩也就越为突出,陈亮如此,叶适如此,以至永嘉学派蜕变成为一个文学流派。历来认为叶适工文,所以他的弟子多流于辞章,用心于文辞。这显然是皮相之谈。文章之道成为永嘉学派的专门之学,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巨大的包容性和强烈的会通色彩。叶适平生以打通道德与功利与文章的隔阂、超越诸家之局限为目标,故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文章统绪。叶适的视野是开放的,他的批评是多方位的,其思想体系是庞杂的。叶适能凭借他的才、力、胆、识,将各种学问融会贯通,但其子弟无力承继,在传承过程中,永嘉学派逐渐分化,就出现了醉心性命之学者、专攻经制之学者及所谓的“文字之学者”。由于其思想的原创性较少,故文章一脉更易得到充足发展,继承叶适“文字之学者”众多。永嘉学派的蜕变生动说明,理学与古文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道统与文统的分离与对峙只是暂时的,理与文的融会却是必然的,融会的程度取决于“道”的开放程度。即使那些执著心性义理的正统理学家,依然以各自的淑世情怀,给文学保留了一个独立的生存空间。

总之,把“古道”作为理解“古文”的核心因素,就等同于发现了“古文”与理学之间的天然桥梁;承认这座天然桥梁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具备了更为开放的心态和更为开阔的视野,这就为深入理解南宋散文的主体——理学家之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以理学的影响为切入点,来进一步体察倚重于“古道”的“古文”的特征,自然就拥有了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三

“古文”对“古道”的倚重,具体到作家而言,就是其艺术风格对艺术精神的倚重。古文大家往往以其深厚的学识为创作基础,其哲学素养总是和他的人生旨趣统一在一起。这种人生气质展示在古文创作中,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艺术精神。古人常说“文如其人”,要“知人论世”,要“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也就成为最为习见的批评手段。但是,无论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还是“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这些评论家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都把追逐作者的意图作为核心目标。然而,这种追索和反求,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旅程。一方面它们既为文字,就不免有糟粕之讥,并不一定能尽作者之意;另一方面,由于主体间的差异,即使知音,也“未必得弄笔人之本意也”而生之高厚,或有壬甲之误,更何

况古来知音难求,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异,理解的障碍也会更加突出。

因此,古人“知人论世”,多诛心之论,论文以立意为先,常不免穿凿之嫌,有一叶障目之弊。更何况他们往意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何异说梦”之嘲,庶几难免。即使偶有神来之笔,切中肯綮,也可能引而不发,颇为零散。今人“知人论世”,则千人一腔,万人一面,往往落入生平——思想——艺术的窠臼,下笔常常不知自休,洋洋数千言而可以丝毫不着边际。作家的政治取向、生活态度及其社会环境成为关注的焦点。作家的艺术个性,为时代的政治氛围所笼罩;作品的艺术特征,为作家的政治情绪所吞没。文学批评的程序,就固定为材料的罗列与标签的分类。而于艺术成就,或极口虚赞,神乎其神,或理论先行,削足适履。

我们认为,所谓“论世”不仅要注重政治氛围,更要注重其文化动因。具体到南宋散文而言,其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和战之争贯穿始终,抗战与救亡的呼声响彻云霄,故爱国志士的慷慨之文颇为引人注目。但是,战争不是南宋人全部的生活,文章的特色不形成于岌岌可危的短暂瞬间,南宋人有其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中兴”时期。这里的“中兴”,不止是经济的“中兴”,更是文化的“中兴”,其一代文章本色即形成于此时,展现于此间。舍此“中兴”之文略而不论,仅仅注目于南宋首、尾之文,何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南宋文化的中兴,主要展现为理学的繁荣,主要表现为学派林立,主要体现为学术之争异常激烈。舍此理学家之文而不谈,而津津乐道于少数词人、诗人之文,又何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南宋散文,对学者之文避而不论,其所谈论者,又何其有限?南宋散文的研究,焉得不一片沉寂?

同样,我们认为所谓“知人”,不仅意味着对作家生平、生活态度、政治立场思想的把握,同时还意味着对其艺术精神的领略。因为作家的艺术精神,往往会对其文学主张、思维模式、审美观念、艺术趣味、风格趋向乃至创作方法产生重大影响。作家艺术精神的形成,又离不开学术思潮的演进。“知人”与“论世”,也就此联结起来。具体到南宋理学家而言,他们各自的学术观点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旨趣,他们各自的人生旨趣影响着他们的艺术精神,他们各自的艺术精神又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思想与古文创作。南宋理学大家的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文章风格就这样极为和谐地贯穿起来了。这种高度的和谐、完美的统一,是其他时期所少见的。

如陈亮的核心思想,就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1](第 299 页)。他言利,就是要讲事功;讲事功,就要行“霸道”;行“霸道”,就要尊英雄、做豪杰。陈亮的人生旨趣,就由此形成。他是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1](第 280 页),成为“风雨云雷”的英雄,做“人中之虎,文中之龙”。这种追求,使陈亮为人慷慨磊落,不肯苟同,其艺术趣味亦独嗜阳刚之美,行文更崇尚爽朗健拔,自有一种震慑人心、不可阻遏的恢弘气势。

又如朱熹以一代宗师自许,为人安详、雍容。他所追求的是圣贤气象,其至高境界就是温厚平和,清心寡欲,无怨怒激发。故论文亦力主中正、平和,力主用字、出语平易。他认为“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2](第 4318 页)。他的文章,也“大率只是平和而意自长”,说理周详,条分缕析,无褊躁之言,无过激之论,不求雄伟,不求奇峭,疏宕袅娜处亦自有一片烟波,虽无搥金伐鼓之声、慷慨激昂之气,亦无暗弱、萎靡之态,总是一派冲夷、和穆气象。其文脱略鄙俗之质,却从不作高深危险之语,毫无装点修饰,直以明净畅达取胜,神采隐隐,风格骨力,与其宗主气派密合无间。

再如陆九渊,他主张向内发明本心。认为只有立心,才能自得、自成、自道;只要收拾精神,就能独立自主,自我作宰。因此,在对待前人的作品时,他一方面要求读者注意把握领会作者的整体精神与风格;另一方面,读者更应该保持自我意识,以自己的人格精神与其相磨荡,不受其羁绊约束,不沉湎于其间而丧失自我,发挥“六经皆我注脚”^[3](第 395 页)的主动性,充实自己的气质。他认为即使无知无识之人,也不妨堂堂正正做个人;作为文人,更当勇于表现自我风貌与精神。只要写出自己的真精神,真风貌,哪怕才力不特出,也不失其特色。陆九渊单篇文章,多言随心出,独抒己见。他的语录体现了直指本心、明心见性、感发意志的特色。多启发语,多训诫语,多点拨语,多警醒语,但绝少长篇大论的阐述与严谨不苟的推理,甚至其前后观点也不尽吻合,但却总能针对发问者的具体情况,以独特的譬喻和辩驳使对方“顿

悟”。

叶适亦是如此。他力图通过对经典的系统批评来印证儒家精神, 树立自己的特色。他对儒家经典、非儒家学说乃至本派观点, 都持有一种质疑的态度。叶适对历代作家包括当朝文士都有所肯定, 但同时对他们所存在的缺陷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对苏轼文章的纵横倏忽非常赞赏, 不过他对由此带来的空疏之弊十分警惕; 他对欧阳修文章的学习是全面而充分的, 但对欧阳修刻意为文的一面又不以为然。叶适能够吸收各家之所长, 同时又明确指出文学创作最为关键的在于“自家物色”。这种创新精神, 终使其文章“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

前人曾言, 艺术莫难于古文; 而文学研究之难, 又莫甚于古文。古文研究园地的清冷, 或与此有关。历来研究者对原始文本有意无意的疏离, 本是古典散文研究园地难以根治的痼疾; 研究者观念的滞后和研究方法的陈旧, 也极大钳制着古典散文研究的突破。如熊礼汇教授在《先唐散文艺术论》中所言, “多年来, 在古典散文艺术研究中, 存在一个较为突出而又不易察觉的毛病, 就是不能真正从中国古典散文的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地探寻其艺术发展规律。许多事实表明, 古典散文艺术研究要有所改观, 古典散文研究者必须转变观念, 改进方法。”所谓转变观念, 就是扬弃现代散文和西方美文的既有理念, 结合传统散文的认知模式, 演绎古典散文的艺术特质; 所谓改进方法, 就是摒弃理论先行的分析程序和削足适履的批评范式, 合理运用传统的品评方式, 建构古典散文的批评话语体系。总而言之, 对古典散文的研究和批评, 必须依托于传统散文自身, 必须立足于对古典散文生存环境和发展态势的详细讨论, 必须延伸到对散文作家艺术趣味和艺术精神的深入剖析上, 即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 重拾茫茫坠绪, 锻造出和传统散文血脉相连的批评体系。

[参 考 文 献]

- [1] 陈 亮:《陈亮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 [2] 《朱子语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 [3] 陆九渊:《陆九渊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责任编辑 何坤翁)

Research on Southern Song Dynasty Prose: Problems & Solutions

Min Zeping

(School of Humanity Science,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04,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rose research is extremely lonely, one of reasons lies in the South Song idealistic philosophers' prose to be desolate. But the mainbody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writers is scholar. The article core is ancient moral, but non-language ancient, literary style ancient, literary style ancient.

Key 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prose; desolate; Neo-Confucianism; ancient prose